

第二十六章

又一处淫窟——“樽町”

“混蛋，畜生！你老婆死啦，连头发都不剪，脸也不刮？看看你那浑身上下一身骚！滚出去！……”静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内田顾问的咆哮声。顾问室门被推开，佐藤上尉缩着脖子灰溜溜地退了出来。边走边摸着脸上的胡茬子，一副手足无措，狼狈不堪的样子。在顾问部中，佐藤因其办事干练、忠诚可靠一直受到内田的器重。今天大概碰上顾问心绪不佳，平白挨了一顿臭骂。所幸没挨一通“土内”（竹剑）也算便宜了。中午，吃完饭我陪他去吉祥理发店给整个脑袋来了个一扫光，并劝他添置一身新衣服，弄得齐整点儿，别惹顾问生气。佐藤低着头长叹了口气，一言不发。

在行伍中，军人不论官职大小，必须剃光头，据说是战争中头部受伤便于包扎。而文职人员则不受限制，可以留头发。

佐藤上尉的胡子、头发大概两个多月没理了，足有一寸长。衬衣领子脏得发黑，军服上衣襟开线起毛，马裤洗得发

了白也照样穿；皮鞋多日没打油，灰头土脸儿的样子，整个一个邋遢兵，确实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形象，不怪挨骂。

其实，佐藤的颓废形象是当时日本军人真实面目的写照，具有普遍性代表性。

江上军司令部订有两种日文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各十份。除顾问室独享两份外，其他几份由各处室传阅。日本军官的习惯是每日上班后必先读报，看不到今天的新闻便无心工作，各项业务一概停顿。有时报上登载重大新闻，没传到的便等不及了，挤上去三四个人聚着脑袋一起看。

《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是日本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新闻媒体，其时效性、权威性无可比拟，所以极受重视。虽然日本军方严格控制舆论工具，极力掩盖战争局势和战况真相，但仍无法一手遮天，许多战争新闻和重大国际事件都不可阻挡地出现在每日报端。

当日军偷袭珍珠港一举成功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时，日本军官中就有的愣头青大叫起来：“嗨，咱们大日本皇军真不赖呀，敢与全世界为敌！……”话音刚落，后屁股就挨了一脚：“八卡！住嘴！”比他高一级的军官立刻对他进行训戒、警告。其实不止一个人持同样看法，别人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1944年以来，日本本土连续被美军轰炸，国民生活每况愈下，水灾、旱灾、虫灾的报导时时充塞报纸版面。这些消息对关东军和“满洲国”各级政府机构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些报纸士兵绝对看不到，军官们也不敢随便议论、传播。但是，生活、工作在他们中间的我却十分清楚，这些日文报纸对我来说没有文字障碍，我和日本普通军官知

道的一样多。那些不懂日文的“满人”军官我就不了解了，反正我对这类消息一向守口如瓶，绝不乱传，免得给自己惹麻烦。

看完报纸后，有的人就会伏在办公桌上暗暗流泪，有的则坐在那里发呆，低头不语，也有的互相对视一眼，默默散去；也有的叹口气把报纸扔给别人，自己点上一支烟抽起来……兄弟阵亡，家乡受灾，国内父母音信皆无，自己家住的都市受到美军空袭、轰炸……种种噩耗困扰着他们。工作、生活、军务执勤时这些“大日本皇军”的眼神里便会时时流露出某种慌惑和绝望。前几年的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骄横已很少出现了。

悲观失望、消沉颓废的情绪，像看不见、闻不着的一氧化碳弥漫在人们的心头，无法趋散。听天由命，破罐子破摔的也大有人在。中午吃饭时，有的人就悄悄地从裤袋里掏出一个扁扁的小酒壶，溜一眼周围见没人注意便捋上两口，就着大米煮黄豆的饭咽下去。不过，这要是被丰永和内田顾问发现，那一顿竹剑的暴打恐怕会比老烧酒更烈上几倍呢！

其实，论工薪、待遇，日本军官的收入是很优厚的，先是工薪以外的“国外劳作津贴”就占工薪比例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一个日本上尉的收入要比“满人”中校、少校的工薪高出一半还多。按理说，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对要好一些，其实不然。

江上军中的日本人大多数是“在乡军人”（退役军人）重新应召，每人按原职衔一律晋升三级后入伍服役。因此，这些人都年龄偏大，拖家带口。而少数的年轻人则属于正规军体检不合格者，他们在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煽动和指令下，抱着来“满洲国”淘金的热望踏上了征途。当“大东亚

共荣圈”的梦想明摆着已无法实现时，如何维持生存下去便成了他们惟一追求的目标了。

思乡、厌战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他们辛酸的生活。他们每个月都要想方设法将自己在“满洲国”用血汗换来的钱尽可能的寄回日本老家去。尤其家在农村的日本人，那里的生活极端艰难。战争带给他们的苦难是亲人死去，家园被毁；而老天爷又将水灾、旱灾和虫灾无情地摊派到农民的头上。日本本土的国民经济已被战争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少将参谋长林保治月薪五百多元老羊票，但他每月都派我跑趟邮局，给他日本的老家寄回去二百五十元，剩下的这一半还要维持四口之家的一切费用。他在本市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在士官学校，一个女孩读国高一年。所以，如果不精打细算，恐怕他连参谋长的体面也不好维持。

其他下级军官就更不用说了。一二百元左右的工薪得寄走一半，剩下的钱养家糊口就有些吃紧。那一套军服穿五六年是常事，尽管每年都有服装津贴领下来，但这笔钱都舍不得花，盘算一下，还是寄回日本老家去的好。有时肩头的军衔换了，但浑身上下恐怕还是几年前的“老战袍”。衣襟绽破，马裤陈旧，屡见不鲜。你如此，我也这样，彼此心照不宣。

为了支撑大日本的圣战，皇军官兵和平民百姓已经克勤克俭到了如此地步，不知天皇裕仁的饭碗中是否也掺进了东北的大豆或者高粱？

在这种秋草逢霜的局势下，偏偏却传来了一个令一部分人欣喜若狂的消息：日本内阁颁发了“朝鲜人同名改正令”。

这份已经人人皆知的“绝密文件”规定，凡在满洲和朝

鲜半岛上的朝鲜国人，皆可按原姓氏、笔画的谐音改为日本人的姓氏。三字、四字、五字不限云云。

这下可乐坏了本来已自诩为半个日本人的朝鲜人：如今他们终于可以变成名正言顺的“整个”日本人啦！其兴奋与荣誉感无不溢于言表。

江上军司令部内的朝鲜人统计起来大约有军官十儿人，文官二人，女打字员一人，雇员一人。其中以朝鲜人中尉权相睦的官阶为最高。此人从来就以半个日本人自居，在“满人”面前趾高气扬，这回改为日本名姓：权平相睦，自己觉得已完全脱胎换骨，变成纯正的日本人了，立刻留起了“鼻涕胡”。其实他改不改姓我看都像日本人：趴鼻梁，罗圈腿，走起路来像鸭子，一说话，公鸭嗓。我老婆学校的女教师于慧清，是伪军事部长于琛澄上将的亲侄女，慕其少年得志又改了日本姓氏便下嫁给他为妻。日本投降后，权某返回韩国，于小姐成为弃妇。这是后话了。

江上军舰队里的几个朝鲜少尉也纷纷改成了日本姓氏。如果不是鉴于前年兵变的教训，不知这些人又要摆出多大不可一世的架子来。

丰永的情报处新调来一个身份不明的朝鲜人朴玉顺，二十五六岁，小个子，长得驴脸大下巴，走起路来神气十足，下巴撅得比鼻子还高。这些日子竟接二连三地当众提醒我：“喂，老左，老左，叫你呢！以后你可不许再叫我老朴了，我现在叫‘大石’了，记住了吗？”

我用白眼翻了他好一阵子，没理他，心说：“狗杂种，没大没小！哪天非找茬儿赏你个耳光，作为祝贺你忘了祖宗的礼物！”再去情报室，我故意喊他“朴大石”或者“大石朴”，提醒他别忘本。气得他干瞪眼，没咒念。

这家伙不愧是干情报工作的，心眼活，脑瓜儿转得快。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已经弄明白了我的分量，几次想在丰永和内田顾问那里拆我的台都碰了钉子。打不得便要拉，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同类人物通用的手段。老朴立刻变换了手法，这不，星期六下班就在后走廊里笑眯眯地拦住了我：“左君，明天中午我请客，咱们去太阳岛玩个痛快，怎么样？千万给个面子……”我本想拒绝，但又不便让他难堪。与这类人物还是别作仇的好。于是，只好答应下来，反正星期日也没什么事。

“好，那么一言为定，明天一点钟，道里码头上见！”他高兴地拍拍我胳膊，迈着罗圈腿一摇一摆地走了。

按惯例，每礼拜日下午我都要带着老婆孩子去岳父家串门。一早起来，我就催促老婆梳洗，收拾孩子，要提前走。

出门坐上“斗子车”（一种哈尔滨特有的俄式马式）。那位头发似乱稻草、鼻子像胡萝卜，穿着肥大绸缎灯笼裤的白俄老车夫把马鞭子甩得山响，大马车便一颠一抖地直奔西郊的新正阳河铁路住宅区奔去。

岳父是老铁路工人，在中东铁路没卖给日本人以前常和老毛子打交道，俄语说得挺好，可惜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这天，岳父家里人来人往，似乎有什么大事。一问，原来是这几天推牌九输得太惨，几个“家礼教”的徒子徒孙们来与他商量，要摆香案，收礼金，以此来敛财好渡过难关哩。这种主意不算馊，我知道“家礼教”的人常这么干，岳父的师兄弟们如果“弄景”，他也得照样出钱，要不怎么叫患难与共，义字为先呢！

我对这种事从来不感兴趣，还正好借此脱身。于是，匆

匆吃过午饭便要去赴约。老婆对我此行颇有疑心：“他一个光棍子约你游什么太阳岛！你这谎可没撒圆，别是去跳舞吧？不定哪个婊子又勾引你……”她还在没完没了地数叨，我人已经到了公共汽车站。

中午，天空万里无云，骄阳似火，道里区江岸的游人不多，但江面上却是星星点点天女散花般地布满了游江、摆渡的舢板。女士、孩子们漂亮的衣裙和五颜六色的花阳伞，将夏日的松花江打扮得格外艳丽、妖娆。

十几米外我就认出了面向江北正俯栏远眺的老朴——哦，大石。他穿着土红色的西服上衣、白裤子，罗圈腿，挂在栏杆上像个红白相间的救生圈，特征十分明显。奇怪的是他身边还站着一个身着鲜艳和服的少女，这是谁呢？这回可不能再喊“老朴”了。

“大石君！”脱口叫了出来。

大石和那位姑娘一齐转过身来，惊喜大叫：“哈罗！左君，真准时啊，够朋友……”他说的虽然是日语，但不太纯正。

大石殷勤地向我介绍：“这是我妹妹，大石玉子。二十啦！在南岗满洲油脂会社工作……这位左君是我军的翻译官，大红人哩！”

他妹妹放下洋伞向我深深一礼：“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也是一口日本语，但也稍带点明太鱼味。这个刚蜕变成日本人的朝鲜少女，个头儿和她兄长差不多，扑满白粉的脸上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睫毛挺长。除了下巴大了点儿，倒也娇嫩可爱。

走下台阶，我们喊来一只舢板，跨上去划向太阳岛。

大石让他妹妹和我并肩坐在船尾，他操起一只桨和船夫

一起划了起来。但看他那高起大落，弄得水花四溅的架势就明白他是个外行。玉子撑起了花伞，东张西望，兴趣盎然，大概平时很少有机会出来玩。一条小白鱼被桨声惊起跃出水面，都会引起她惊喜的叫喊，快乐得像小孩子一样。

弃舟登岸，便是白得耀眼的沙滩和浓艳欲滴的绿树丛。此时，市里坐船来的中外游人纷纷拥上沙滩。色彩缤纷的泳衣，各种肤色的人体在阳光下闪动，令人眼花缭乱。大石贪婪的目光在尽情地捕捉欧洲女人肥臀细腰的倩影，一副焦渴难耐的可怜相。这小子二十六七岁了还在打光棍，请我游太阳岛恐怕不只是为了了一饱眼福吧。我心里纳闷，便提议下江游泳，谁知一问，这兄妹俩根本不会水！我不禁有些扫兴，只好陪着他们到处游逛，在白俄老太太的大遮阳伞下喝汽水和“格瓦斯”（俄式饮料）。

一个多小时过去，大石好像兴犹未尽，可他妹妹却已露出了疲倦的神态。玉子的皮鞋走在沙滩上挺吃力，那身和服虽然十分轻薄，但又肥又长，拖到脚面上。尤其紧匝在前后腰的那种“腰卷”恐怕早捂得她香汗淋漓了。两颊的白粉已被汗水冲出了流痕。于是，我们只好坐上回江南的汽艇返航。十几分钟后，已在道里码头登了岸。

大石俯在玉子耳边用朝鲜话不知嘱咐了些什么，玉子点点头冲我嫣然一笑，摆摆手乘上一辆洋车直往中央大街而去。

打发走妹妹，大石像甩掉个包袱似的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丫头非要跟着出来玩，可走一会儿就累啦，多烦人……”他看看手表，把大下巴一扬，大声道：“左君！这回我们去‘柳町’逛逛怎么样？走。”

我们顺着紧靠江边的“警察街”一直往东漫步而行，穿过公园和水道街来到地段街北头，“柳町”就在望了。

“柳町”顾名思义，即花街柳巷。在哈尔滨也算一处“名物”。我虽然早就听说过，但从未涉足，因为这里并不是谁都可以去的地方。与道外北七道街和十六道街的妓院完全不同，“柳町”的妓女百分之九十五是朝鲜人，也有一部分日本女人。不懂日语的朝鲜女人无论姿色如何也没资格到这里来混生活，因为“柳町”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日本现役军人。其实质，与前线的“慰安所”相同，只是比较高档、“文明”一些而已。其中的一少部分日本女人之所以沦为娼妓，都是因为出身低下，命运多难。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了工作的歌舞妓、酒店下女或者是盲目来到满洲投亲不遇的不幸女子常被日本浪人（流氓）拐卖到这里。

“柳町”的老板是在满洲有相当后台势力的日本人，大多为日本国内黑道上的浪人头目。他所雇用的“大茶壶”、打手等人也是他的同类。这些人一般本身有生理残缺不能服兵役（或者弄到某种医院的身体残疾证明而逃避了兵役）。据说为了对付来捣乱的日本兵，老板和打手还有达到了柔道“二段”、“三段”的高手呢。

“柳町”横跨地段街和买卖街的北部两头，足有几百延长米，占地面积达两千多平方米。如果从高处望去那是一大片玻璃顶棚的建筑（类似现在的农贸市场）。围绕着“柳町”，小餐馆、酒店、咖啡馆和鸦片、吗啡零售所等等明里暗里的东西交织成一片热闹闹、灰蒙蒙的蜘蛛网，将这淫窟养成了一只五毒俱全的大蜘蛛。“柳町”内部分成南、北、中三道小街，用木质材料间隔成许多日式的独门窗的小屋。两层楼的结构，共设有六道小楼梯供人出入。到这里游逛、

寻欢的日、韩、“满”人嫖客从外观和服饰上根本分不清楚。日本关东军的军官、士兵穿梭往来，进进出出互不干扰。但这里一律使用日语，妓女的服饰也完全是日本和服或西装，小衣长裙的朝鲜服装一件也见不到。小屋的外观、拉扇门，里边塌塌密、装饰画也是地地道道的日本风格、情调。为的是让日军官兵一来到这里便如归故里，以慰乡愁。

据我观察，在这充满异国情调的大型“人肉市场”中至少有上百名朝鲜、日本妓女在这里服务。女人的香粉味和大兵身上的汗臭混杂在一起，让人无法推断其化学成分，找不到准确的字眼来形容。大石走在前边，大人咧咧左顾右盼，似乎旧地重游；而我跟在后边简直就像刘老老初进大观园，心中十分好奇又有点忐忑不安。突然，身边一个纸隔扇门拉开，一个女人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就往小屋里拽。我吃了一惊，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短小的内衣裤的妓女。她笑着用日语说：“先生，快进来吧，还到哪儿去呀……”这女人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只是厚粉没盖住鼻上的雀斑，一笑起皱，几乎掉渣。脸有些过长，如果在大石家相遇，我一定认准是他妈。我挣了两下没逃脱，失声叫了起来。大石闻声转身，立刻三脚两步跑了回来，举起拳头冲那妓女道：“快撒手！混蛋，要抢人吗……哈哈！”看见我的狼狈相，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谁让你长得这么帅！人家看上你了，也许不要钱呢……走吧，我给你找个嫩点的。”

沿途，我们又摆脱了几个妓女的拉扯、纠缠，终于在南侧靠近楼梯口的小屋里找到了大石的“老相好”。这女人比大石高半个头，长相倒不俗，满说得过去。

我们走进室内，脱下鞋子在塌塌密上坐了下来。那女人日语十分纯正，几乎不像朝鲜人。打情骂俏了一会儿，她便

走出去，不一会儿，拉进来一个比她年龄稍小的朝鲜女人。身材娇小玲珑，气质、风度几乎与日本的大家闺秀无异，只是不太爱说话。大石认为我已经中意了，便点点头从红西装上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元的纸币扔在了塌塌密的凉席上。

他的“老相好”娇嗔地说：“哟，你们可是两个人哪！这些钱只够一个人份稍多一点……”

我一听，脸上有些发烧，想站起来掏钱，但大石已经把第二张十元钞票扔了出来，弄得我十分尴尬。对这里的规矩、行情我确实一无所知。在董六的妓院里和十六道街圈楼的高级妓院一般都可以讲价，根据主、客各人的条件可以“按质论价”，事后如果嫖客满意，还可以给小费，少则几元，多则几块“袁大头”都说不定。但这“柳町”看来是官定的牌价，而且大概还有固定的“收款处”。果然，不一会儿去交款的那个女人回来了。她手里托着一个小木盘，里面有找回来的几元纸币和一些零零碎碎的硬币，另外就是印着元、角等字样的卡片。这种卡片原来是限于一定范围内使用的一种代用券。大石一见有些不耐烦，一挥手：“这些都归你们了……”拉起这个女人就头也不回地跑到另一个房间去了。这个光棍汉此时已经有些饥不可耐了。

这时，留在房间里的小女人已经把纸隔扇门拉上，脱去了自己的洋式衬衫和裙子，只穿着一件三角裤和比乳罩稍大一点的内衣，半裸着身体开始拿枕头、铺床。我冷眼望去，她的皮肤虽然很白，但已失去光泽显得粗糙，前胸丰满却已下垂，尤其当她站起来时，那双最令人厌恶的“O”型腿，叫我彻底倒了胃口。

我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更何况，经常出入丰永设在妓院里的联络处，所以我对妓院、妓女和这一行的一切都不

陌生。仅仅是因为对“花柳病”——梅毒的恐惧，使我从不敢与妓女有染。王军医曾警告我，一旦染上这种性病，无药可治，且遗传三代人，还给我看过梅毒病人烂鼻子瞎眼睛的图片，让人恶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这小女人铺完床单就过来给我解领带，我忙制止了她：“小姐，我太渴了，能不能给我弄点茶来，凉的也可以……”

她有些惊愕，眼勾勾地看了我一阵，站起来出去弄茶水去了。不一会儿，拎来了一小壶温茶，我们便坐下来对饮起来。

我说：“一切多谢了。我今天有些感冒，身体不适，就不给你添麻烦了。这次是刚才那位先生为了应酬才……”

这朝鲜女人脸上毫无表情，只是一个劲儿地给我斟茶。她悄声问：“那位先生是日本人吗？我看，他也是我们……”

“完全正确，而我是‘满人’。”

“哎呀！一点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您是日本银行的职员呢。”

于是，我们开始用日语拉起了家常闲话。

原来这女人是朝鲜平安南道某乡的农家妇女，二十二岁。两年前，丈夫姓金被日军改姓金川，应征入伍，送到中国华北战场充当炮灰去了。家乡去年遭受了洪涝灾害，与她相依为命的婆母连饿带病也很快去世了。她没有孩子，孤身一人无法生活，曾伙同其他朝鲜人来到满洲，在牡丹江开了一阵子冷面馆。后来因为经营不景气就迁到了奉天，又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在这里她没有一个亲人，但幸好带有衣物还稍有积蓄。所以，在“柳町”她是一个自由妓女（与北七道街一带“自混”妓女相同）。她指着小木盘里花花绿绿的纸片说：“现在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你看，这些纸片叫‘兴

行券’，是一次嫖妓的三分之一附加费。”原来，“柳町”的自由妓女和老板是四、六分成，但归到妓女名下的那点钱却有一大半被兑换成了这种代用纸币，这种代用纸币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而不能当钱币在市面上流通。

这种花花绿绿的“兴行券”上浸透着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的血泪和汗水，流通在妓院、歌舞厅、咖啡馆和鸦片管烟所（官办的公开吸食鸦片的地方，多带暗娼），直到将她们最后的一点血肉榨干。而被这些纸片所替代的现金则通过“花界会”抽头后上缴财政，成为“满洲国”国库里的财富。

“我与老板的四、六分成，本来还能维持，但这里不管吃穿。除了吃饭，再添置几件衣服也就剩不下几个钱了。如果穿戴不入时，老板就会骂，甚至扇耳光。人家是日本人啊……唉，什么时候仗能打完，我的丈夫就会回来了……”她扭过头，悄悄拭去眼里的泪花，又给我斟上一杯茶。这茶变得十分苦涩，仿佛掺进了她积蕴多年的眼泪。

“喂，朋友！干完了没有？该打道回衙啦……”大石好像酒足饭饱，在走廊里大喊大叫。隔扇门被一把拉开，大石站在门口，精神焕发，满脸涨红。身后站着那个比他高半头的女人，头发蓬乱，一言不发。

这时我已穿好了上衣，正在穿鞋。身后的金姓女人欲言又止，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

大石搂着我的肩头不住地问：“怎么样？朝鲜娘儿们另有一种风味吧……”我觉得今天有点对不起大石。这次花销大约占他全月工薪的三分之一还多。我打算晚饭请他去八道街的“魁元阁”吃水煎包，回报一下。

在楼梯口，迎面碰上了内田顾问的司机叶山。我有点不

好意思，但大石和叶山却毫不在意。这里本来是个消闲场所，“满洲人”，甚至警察之所以不敢光顾，主要是这里通用的是日语，无法交流，又是日本风情，不习惯而已。其实，只要你肯花钱，谁来都欢迎。

叶山说，内田顾问最近被痔疮闹得寝食不安，连沙发都坐不了，已经好几天没上班了。太太前天晚上又去了“新京”，专车一直闲着。多莎子小姐又不爱坐。今天闲着没事逛了一会儿“登喜和”、“丸商”又转悠到这里来了……我们招招手告别，还没出门，北楼口传来打斗、吵骂之声。各个小屋的拉门先后探出一排排妓女和嫖客的脑袋来。“柳町”的走廊大厅里一片混乱。

原来是三个日本兵不付钱就把三个妓女拽到屋里来了一场小巷战，战斗结束，甩手就走。日本“大茶壶”拦住他们讲理，三个日本兵刷地抽出了腰里的刺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大吼：“老子在前线卖命，谁给老子钱啦！慰劳一下皇军，是你们的光荣，……八卡牙路！”

被逼在墙角的日本“大茶壶”吓得一动不敢动。这几把刺刀如果将他钉在墙上，他也是白死。不过嘴里还挺硬，直喊：“混蛋！快去叫宪兵啊……”人们全在看热闹，谁管这闲事？你这“茶壶”被捅漏了大家看着才开心呢。

三个衣冠不整的“皇军”哈哈大笑，收起刺刀，互相搂搂抱抱扯起嗓门，唱起了日本幕府时代的戏曲：“是酒啊，还是眼泪！花姬哟……只有死，才是我们的归宿……”踉踉跄跄地远去了。

“魁元阁”的水煎包在哈尔滨名闻遐迩，也是我最爱吃的风味食品之一。我和大石连吃带喝消磨了两个来小时，大石有滋有味地品着酒，和我东拉西扯。谈到朝鲜人改姓的

事，他说：“左君，说心里话，我们对这类事已经麻木了，谈不上什么高兴不高兴。我叫朴玉顺也好，叫大石也好，骨子里不还是朝鲜人吗？真有那么一天（指日本战败），”他用大拇指点点身后（指朝鲜老家），“我们还有那个地方可去呢，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他又说：“我父亲朴长德如今叫大石长德了。他在市警察局特高科任副科长。特高科是对敌工作的，外国间谍、中国共产党是他们主要的捕捉对象。因为父亲一直没有什么业绩，日本人对他很不满意，一连三年了，警尉的阶衔也没升上去，好不窝囊啊……”怪不得他能进入丰永的情报处，原来是特务世家。

走出魁元阁，天已经黑了。

从东街口一个日本酒馆里走出几个步履蹒跚的日本“神风攻击队”的空军军官。一个个衣冠不整，东倒西歪地互相搀扶着来到大街上。他们看见一位正从马车上下来的外国女人，冲上去就抱住不放，将胡子拉碴、酒臭熏人的嘴凑上去要接吻，吓得那外国女人尖声大叫起来，挣出身子又爬上马车，拼命逃走了。

这种场合，如果碰上的是日本女人则大不一样了。日本女人一般大多半推半就，任其搂抱亲吻，嘴里还得说：“勇士们，别这样好吗！我们爱你们呀，你们是大日本的救星、恩人……”然后设法脱身。

这些“神风攻击队”的空军飞行员，在战争中与日本陆军的“敢死队”一样，是用肉体携炸弹去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屈死鬼、炮灰，一旦出征便有去无回。在日本军国主义狂热的“武士道精神”灌输下，以死效忠天皇。在太平洋海战中，击沉美英战舰和航空母舰的往往不是鱼雷和大炮，而是

载着炸弹的飞机直冲舰船甲板、炮塔，甚至大烟筒，只要俯冲时没被炮火击中，便往往奏效。被盟军称为“肉弹”，十分可怕。因此，这些有去无回的“神风攻击队”队员，在日本军队中地位特殊，备受尊崇而少有约束。走在街上胡作非为连宪兵都不管，而且一见他们就远远躲开，省得惹麻烦。看到这些人，我和大石也赶快溜墙根，加快脚步离开。

大石把我送上公共汽车，挥手道别。

我到了岳父家，老婆的脸已经拉有二尺长。我自知理亏，忙赔笑脸，问岳父摆“香堂”的收益如何。从他老人家得意的表情来看，今天徒子徒孙们奉献的礼金大概不少，不但能还上赌债还略有盈余呢。

我扔下吃剩的水煎包，抱起孩子出门叫了一辆白俄开的瓦斯汽车，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家。给了司机两元钱，乐得这老毛子连说：“丝巴细巴（谢谢）！”